新儒家哲学十八讲

方东美　著

中 华 书 局

弁　言

本书系方东美先生在辅仁大学讲授《宋明清儒家哲学》的录音笔记。讲授期间，起自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迄于同年十二月三日，共十八讲。由于本课程原订为一学年，方先生因病中途辍讲，只讲到宋儒张横渠。因此，本编纂委员会议决，暂定名称为《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一方面保留了原课程的名称；同时也表示了不得已的苦衷，用志哀悼。期望读者在这本“未完成的讲录”中，深体这位一代大哲的“孤诣”和“微言”。

至于未竟部分，可参考方先生英文著作《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

方先生于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三日逝世。本讲录堪称为先生之生平“绝响”了。

本书系由方武、谈远平先生初录，张永俊先生校订，其中“第十一讲”是由刘孚坤先生校订。书中内容以原录音为准，如有漏误由校订者负责。各篇标题及各篇中的小标题系校订者所附加，又“（　）”号内之英文中译亦系校订者所译，不妥处概由校订者任其咎。

方东美先生全集编纂委员会　谨识

“方东美作品系列”出版说明

方东美（*1899—1977*），名珣，字德怀，后改字东美，安徽桐城枞阳人。一九一七年入南京金陵大学就读，一九二一年毕业后赴美留学，入读威斯康辛大学（中途曾转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以三年时间完成硕士及博士论文。一九二四年回国，执教于国立武昌师范大学，任副教授。其后历任东南大学、中央党务学校、金陵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校哲学教授（在中央大学长期兼任哲学系主任及哲学研究所所长）。一九四八年赴台湾，任台湾大学哲学教授、哲学系主任；一九七三年退休。曾兼任台湾师范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教授。

方东美先生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是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哲学家、教育家。他会通东西哲学与文化，一生著述丰厚。因方先生在一九四八年即赴台讲学，其作品在大陆甚少流传。由是之故，我局与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基金会洽商，购得《方东美全集》简体字版权；鉴于有部分方先生作品尚未收入《全集》，故本次出版改以“方东美作品系列”推出，以广流布，嘉惠学林。

感谢陈鼓应、傅佩荣、孙智燊等先生对我们的热情支持，感谢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基金会在方东美先生作品系列简体字本出版工作方面提供的协助。

在编校过程中，对与大陆现行用词、表达习惯、学术观点不尽一致之处，除极少处做了一点技术性处理外，一般都予以保留，以存作品原貌；此点情形，敬祈周知。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2-5-4

广大和谐的哲学境界

——《方东美全集》校订版介绍

傅佩荣

方东美先生（一八九九~一九七七年）自幼学习中国经典，进入大学后开始研究西方哲学。二十五岁在美国念完博士后回国教书，直至七十七岁因病而止。

五十二年的教学生涯，表面上是单调而规律的讲课、阅卷、评分、口试，其核心则是一位早熟哲学家的思想体系日益在扩展。所谓“早熟”，是说方先生对于“哲学”这门学问，包括中国的、西方的、印度的，在他三十余岁的青年阶段就已经悟得清晰的定见。正是“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宛如同心之圆，其范围可以无限扩大，“万变而不离其宗”。

方先生亲自撰写的著作并不多，只有三种中文的（包括论文集），三种英文的（也包括论文集），以及一本诗集。占全集最大篇幅的，是他晚年在辅大哲学系的上课录音笔记。现在中文全集共有十种十三册（其中三种分上下册），重新校订出版。今以半年时间校对全集，希望减少手民（其实是先后期的同学们）的舛误，以稍尽对方老师感恩之情。以下介绍全集中的八本书，以方

便读者了解各书梗概。《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另有精采译序，《坚白精舍诗集》亦非旁人所能介绍，尚请读者自行玩味。

以下八本书依序为：

（一）《中国人生哲学》

（二）《科学哲学与人生》

（三）《生生之德》（论文集）

（四）《方东美先生演讲集》

（五）《原始儒家道家哲学》

（六）《中国大乘佛学》（上下册）

（七）《华严宗哲学》（上下册）

（八）《新儒家哲学十八讲》

一、古典的人生哲学

方东美先生常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意思是：与其它古代民族相比之下，中国很早就发展出系统完备的思想。譬如，我们在纪元前十二世纪，就有周公制礼作乐，展现高度的人文精神。此一人文精神后来由儒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继承发展，演变为中国特有的文化景观。

依我所知，方先生自身也可以称为“早熟的”哲学家。他在三十八岁时（一九三七年）发表了《中国人生哲学》的公开演讲，内容涵盖了宇宙观、人性论、生命精神、道德观念、艺术理想与政治信仰。将近二十年后，亦即一九五六年，他以英文撰写《中国人生观》。虽然他强调这本英文著作的内容“均经大幅度的修改与增补”，“不只在语言表达上是新的，在基本材料上也是新的”，但是读者不难发现此书的主要篇章与前书相同，而主要观点也没有太大的变更。这种情况就像环绕一个同心的圆，核心未

改，而外围的涵盖面越来越大，并且逐步撑起了一个立体的架构，最后成为体大思精、周遍含容而一以贯之的系统。

那么，中国先哲的代表是谁？他们的古典人生观有何特色？方先生并列儒家、道家与墨家，视之为三大宗：老子论道，孔子谈元（《易经》上乾元坤元之元），墨子主爱。他们对宇宙的共同看法有三：一，宇宙不仅是机械物质活动的场合，而且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亦即，宇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生机，无一刻不发育创造，无一地不流动贯通。二，宇宙是一种冲虚中和的系统，其形质虽属有限，而功用却是无穷。亦即，我们观察宇宙时，发现万物互相感应，彼此全无阻隔，生出无穷的和悦之气。三，宇宙若究其根底，多带有道德性和艺术性，故为价值之领域。亦即，人类在发挥潜能、实现本性时，将在宇宙中找到至善与尽美的根源。换句话说，人类应该努力使天国在人间实现，而不必鄙视人间，另立一个超自然的天国。

接着，先哲的人性论有何主张？人类以“心的体用”为主脑，寻求“理与情”的交融互摄。在理方面，要“正心尽性，诚意致知”；在情方面，要“存心养性，达情遂欲”。由此展现了：老子的慈惠，孔子的忠恕，墨子的爱利。深入剖析人性，则有以下五点内容：一，性善论是先哲共信的假定；二，性善论“以性承心，更以心继天，天以生物为心，故纯是善，而性顺从天心，万无恶理”。方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最为可取。三，意与知，是理之昭明灵觉处，“从来没有人把它们当作恶看”。四，至于情，则性与情相为表里，孟子“是以性善胜情，情必从之，性既全善，则情亦无不善了”。五，欲恶论则是普遍流行的说法。方先生认为各种人性论之间的冲突矛盾，“都是由方法学的缺点产生出来，毕竟有法可以避免”。他个人的看法则是：“不难由天地生物之仁心以推测人心之纯善，更从人心之纯善以论人性之完美。”

于是，中国哲学的一贯精神在于“把宇宙与人生打成一气来看”。大人或圣人，则是“与天地合德，与大道周行，与兼爱同施的理想人格”。方先生后期讲学经常引用李白的一句诗，“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就是要吸取宇宙生生不已的造化力量，做为我精神活动的基础；或者说是，要以个人小我的努力，参赞化育，安顿人间。

因此，道德的极致是推己及人，再及于万物。艺术则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的”，因为生命总有其可观之处，而人类的创造力也不会终穷。然后，将这一切落实于政治上，则国家成为“一种悠久的道德场合”；于是，先哲的政治信仰“是以德治为最理想，礼治次之，再不得已而思其次，法治尚较术治高明百倍”。

以上所论皆有根据，但是方先生最后忍不住要问：“我们民族原是天才民族，我们的天才埋没到哪里去了？”省思之余，我们不觉得自己肩负着伟大的使命吗？

二、西洋哲学的演变

方东美先生留学美国三年（一九二一～一九二四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开始教书，时年二十五岁。他于二十八岁时在中央政治学校兼任一门“近代西洋哲学”的课；后来又在中央大学讲授“科学哲学与人生”一科。他最早出版的一本书，名称就是《科学哲学与人生》（一九三七年出版）；但是内容只包括计划中的前五章（尚有十七章未写），亦即他讲“近代西洋哲学”的部分。

首先，依例要简介哲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他以科学与哲学对照比较，指出四点：一，科学不尽是具体的；哲学不全属抽象

的。只要是人类理性所开发的知识，皆有具体及抽象的双重性。二，科学的进步是由冲突中挣扎出来的；而哲学并非循环不已的私见。这两者皆有自我批判性，并且不断在改善之中。三，科学或失之武断；哲学常重视批评。四，真确的知识皆有实践性，科学如此，哲学亦然。

其次，人对于自身处境皆有认识的愿望，并且在人生饱经历练之后，会有情感的蕴发。这两者联系起来，获得完整的概念与系统的说明，即是哲学的起因。当然，由时代的发展看来，人类走出神话的天地，开始用理性来思索宇宙及人生的问题，就揭开哲学史的序幕了。

西洋哲学始于希腊，在探讨宇宙万物的起源时，以经验所及的物资（如水、气、火等）来解释，由此摆脱了神话时代。方先生称此为“物格化的宇宙观”，“物格”表示与神格、人格不同，显然会侧重物质而忽略精神。自然科学依此大有进展，但是人生价值反而沦为疑惑。这种宇宙观引起两种反动：一是人本主义，亦即辩士学派所标举的：“人是万事万物的权衡。”但是，这里的“人”如果只是“个人”，而此一个人又依“感觉”为其依凭，则人类社会岂不难逃混乱？于是，经由苏格拉底的努力，推出第二种反动，就是：目的的唯神论。他的主张是：“神是造物主，是一切价值的保障者。惟其有神，所以世界上各种事象都有一个合理的结构、至善的归宿。”

接着上场的是柏拉图，他提出法相界（或称理型界），做为现象界的原始典型，使变化无已的万物获得起源与归宿，尤其是人生行止对价值的企求与向往，也找到了至善至美的统会。如此一来，出现了上层世界与下层世界之间的“分离”。到了亚里斯多德，虽然想以“形式与质料”，“潜能与实现”的双重角度，来解说上下层世界的联系，但是基本取向仍是重上轻下，无怪乎中

世纪以宗教为主导的哲学会欣然接受亚氏的启发了。

方先生当时对中世纪只是一笔带过，他说：“一千年间人类各方面之活动无显著之进步者，其由来已久，非一日矣。”然后，他集中探讨近代哲学，展示了丰富而完整的学术功力。近代欧洲在天文学上、史地上、政教上一新耳目，其自然科学的成就，“把我们从希腊形体有限的宇宙中解放到意味无穷的宇宙里，拓展我们智力的活动”；“把我们从听天由命的迷梦中惊醒到戡天役物的意境里，提高我们生活的情趣”。不过，这样的宇宙观虽合乎科学研究所需，但难免陷入唯物论与机械论的网罗中。

继之而起的是生物学上的演化论，归结为尼采的超人哲学。方先生引述尼采所言：“同胞，快把你们的精神，你们的德业贯注于人间世！用你们的威权，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努力做个健者！努力做个创造者！”

最后，在分析人性时，方先生介绍了机械主义的心理学与动性心理学。后者受生物学启发，较为可取，亦即以人性为整全的、丰富的、可塑的，并与社会相依存。由于方先生此书只是计划中的前五章，所论无法尽兴。他的计划若能完成，则当另有三本同样分量的书。整体看来，方先生讨论西洋哲学，常能准确把握要点，又能全盘观照，评估其得失。国人若想学习西洋哲学，必将于此书获益无穷。

三、生生之德的奥妙

方东美先生从二十五岁开始教哲学，五十二年未尝间断。他所写的单篇论文合成一书，名为《生生之德》。“生生”一词，取自《易经》中的乾元大生与坤元广生，代表宇宙万物生生不已，人类由此体认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充分发挥天赋的德行，追求

和谐圆融与至善尽美的境界。

这本书大体是依论文撰写的年代编成。第一篇是《易之逻辑问题》，探讨《易经》的六十四卦构成的方法。方先生批判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京房、荀爽、虞翻这三家所主张的卦象演变程序，再提出他的一套逻辑，亦即设定“歧出、叠现、相索、触类、引申”五个步骤，希望完满说明全部卦象形成的理由。对于不太熟悉《易经》的读者，这篇文章是既专业又枯燥的。

第二篇论文是《生命悲剧之二重奏》。方先生在文中表示：“乾坤一戏场，生命一悲剧！平生最服膺此两句名言，故立论持说时常以此为譬喻。”他所谓的二重奏，是指希腊悲剧与近代欧洲的悲剧而言。前者描述人类对抗命运时，不觉激发伟大的情操；后者则依托人的理性，企图说明人生的复杂及矛盾，而结果却遁入虚无主义的陷阱。论及西方悲剧的哲学意涵者，本文可谓学界翘楚。

接着上场的是《生命情调与美感》，以及方先生早年在哲学界的成名之作：《哲学三慧》。这二篇论文的内容一繁一简，而主旨相同，都是在对照比较“希腊人、近代欧洲人、中国人”这三者的宇宙观与生命情调。希腊人“以实智照理，起如实慧”，“演为契理文化，要在援理证真”；欧洲人“以方便应机，生方便慧”，“演为尚能文化，要在驰情入幻”；中国人“以妙性知化，依如实慧，运方便巧，成平等慧”，“演为妙性文化，要在挈幻归真”。由这几句话可见作者画龙点睛的功力，亦可略知他如何评估三大文化源流之优劣，以及未来人类应有之走向。

第五篇是《黑格尔哲学之当前难题与历史背景》，这是全书分量最重的文章，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篇幅。本文的副标题是：“借题发挥，论‘系统建立’与黑格尔‘系统哲学’，暂使我国数十年来科学与玄学，实证论与唯心论之论争告一结束。”作者

意图透过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说明科学与哲学各有理据，无法互相化约或彼此取代。文中讨论足以使人大开眼界，赞叹哲学之深刻及高明。

第六篇到第十篇，是方先生一九六〇年代以来应邀发表于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所以都用英文写成，再由学生辈译为中文。第六篇题为《从比较哲学旷观中国文化里的人与自然》。西方有分离主义倾向，中国则显示融贯主义；作者说："一个中国的学者，如果他没有超然的思想，没有宗教的至诚，没有生命实证的道德意识，将不会被尊敬为一位纯正的雅儒。"第七篇是《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谈到儒、道、佛三家的基本主张，皆在点化现实世界，成为理想型态，纳于至善完美之最高价值统会。

第八篇题为《从宗教、哲学与哲学人性论看"人的疏离"》，作者在此文中，画了一个"人与世界在理想文化中的蓝图"，展示人生的九层境界，亦即：自然人、行动人、理智人；艺术人、道德人、宗教人；高贵人、神性人、不可思议的神明境界。依此升进，将可化解人的异化或疏离困境。

第九篇题为《从历史透视看阳明哲学精义》，对王阳明的思想要点皆剖析入微，并有独到之见解。最后一文是《诗与生命》，是作者应台北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之邀，所作的开场致词，其中会通诗境与哲思，藉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劲健，雄浑，流动及高古"来分别描绘儒、道、佛三家的意境，彰显了丰富而奥妙的人文理想。

方先生的论文集代表他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每一篇都值得细读及省思，否则将会错过当代大儒的智慧结晶。

四、哲人的演讲

在方东美先生的全集中，最能引发一般读者兴趣的，或许是他的《演讲集》后面所附录的短文，其目录为：一，传灯微言（方先生在退休茶会上的感言）；二，台湾再抗日座谈会谈话（台日“断交”之后的警语）；三，苦忆左舜生先生（副题是：因及少年中国学会二三事）；四，罗家伦先生纪念谈话；五，段锡朋先生纪念谈话。

从这几篇文章中，我们知道方先生大学时代参加五四运动与少中学会的细节，以及他与同代友人互相往还的真情告白。他在《哲学三慧》中说：“中国大患在无动机纯粹用心专一之学者。……犹幸中国偶有隐逸者流间世一出，不受实际政治支配，孤寄冥往，潜心学理，学术生命之不绝，独赖有此耳。”方先生自己即以这样的“学者、隐逸者”自期。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

然而，他在《演讲集》中的首篇，《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的影响》中，最后发抒感怀说：“这一份情绪，几十年郁积在心里面……在我个人生命是一个惨痛的失败！在国家民族生命则是一个惨痛的遭遇。”他眼见时代的困境，亦即“中国民族的哲学在乾嘉时代就死亡了！一直到民国时代都没有复兴”。既然如此，中国要拿什么哲学去影响世界的未来呢？他在此文中，再度详细解说“人与世界的关联图”。他在早期《中国人生哲学》的演讲中，谈到中国先哲时，指出：他们“遭遇民族的大难，总是要发挥伟大深厚的思想，培养溥博沉雄的情绪，促我们振作精神，努力提高品德；他们抵死要为我们推敲生命意义，确定生命价值，使我们在天壤间脚跟站立得住。”而方先生自身正是这样的中国

哲人。

第二篇演讲是《中国哲学之通性与特点》。所谓通性，是说儒、道、佛三家都对宇宙及人生采取“一以贯之”的观点，求其周遍含容，形成完整的系统；其次，则是发展出各自的“道论”；最后，共同肯定了“人格超升的理想”。至于特点，则作者强调：“儒家意在显扬圣者气象，道家陶醉于诗艺化境，佛家则以苦心慧心谋求人类精神之灵明内照。”这三者合而观之，则是“圣人、诗人、先知”的三德合体，正是人类的共同向往。

接着两篇题为：《原始儒家思想之因袭与创造》，《儒家哲学——孔子哲学》。方先生畅谈他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的起源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哲学的起源有二：一是《尚书·洪范》篇；二是《周易》经传。前者揭橥一种“皇极”（大中，亦即绝对正义）的永恒理想；后者藉由《易经》生生不已的变化，启发人类“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处世智慧。这双重起源，使孔子可以承先启后，提出一套完美周全的人文主义，既可忠恕待人，又可上契天命。

最后三讲是：《漫谈文化问题》、《教育与文化》以及《当前世界思潮概要》。这三讲对于近代以来人类的处境作一描述，譬如佛洛依德所谓的三重革命，亦即天文学、生物学、心理学对人类产生极大的打击与沉重的压力，那么人类何去何从？西方自顾不暇，我们也唯有自立自强，而教育则是扭转乾坤的利器。然而，我们在台湾却缺少一套独立的教育政策，无法摆脱“忘本”的形势，亦即对于自身的哲学、艺术、文学并不重视，根本忘了祖先的天才与成就，这是最大的遗憾。

他在纪念罗家伦先生时说：“我在台大教了近三十年的书，在台湾做大学校长的似乎不只知逢迎上司，而对学问更能重视的又有几位？”台湾有“文化沙漠”之称，应该也不是一件偶

然的事。方先生是纯正的学者，在他的本行中负起承先启后的责任了，但是整个大环境却如江河日下，使中国哲学的精彩内涵无由推广普及于社会。阅读方先生的书，对个人而言足以燃起爱慕文化的热忱，对社会而言则是厚植心灵能量与信念的转捩点。

五、原始儒家与道家

方东美先生自台大退休后，应聘为辅大讲座教授，从一九七三年九月起，开始讲授中国哲学，直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因病住院而停止。这一段时间的上课内容，经过录音笔记，集结为四本书，依序为《原始儒家道家哲学》、《中国大乘佛学》、《华严宗哲学》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总计约百万字。

谈起中国先秦的哲学，体系完整而境界高超者，自以儒家与道家为代表。方先生特别标举“原始”一词，意在展现其原来面目与基本精神。以儒家而言，侧重于其思想起源，由《尚书·洪范》与《周易》（包括《易传》）入手，说明永恒理想与变迁世界如何双轨并立，由此安顿人生，求其长治久安。至于道家，则直接依《老子》与《庄子》，剖析其立论，重构其体系。以下稍作引申。

首先，中国哲学的特色是把存在的领域联系贯通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既不忽略人的核心地位，也能兼顾宇宙大化流行，同时还为人的精神保留了无限提升的空间，使人可以成为圣贤（儒家），或成为诗人（道家），或成为先知（佛学）。换言之，总是要让人在生命过程中，实现更高的价值，由此彰显人类生命的特殊意义。

《尚书·洪范》是中国古代的启示录，亦即神明昭告古代帝